政治科學論叢／第三十三期／民國 96 年 9 月／頁 83～116

意圖與意義
——論Quentin Skinner意義理論中的一些問題*

梁裕康**

摘　要

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Quentin Skinner 被視爲所謂「劍橋學派」的領袖人物之一。其理論的特點在於 Skinner 提出了一種特別的意義理論：歷史文獻所負載的意義不僅是其文字所敘述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其作者述作時的意圖。而要正確地理解與恢復作者的意圖，必須要正確地掌握作者寫作時的脈絡。然而若干學者反對這樣的方法，認爲 Skinner 過度強調作者意圖對於文本意義的影響。本文一方面將試圖釐清這些批評的論點，另一方面要藉由語言哲學家 John Searle 的理論，說明意義的來源乃是來自反應人類心靈的心理狀態，因此文本的意義不只由字面上的語意、而是由語意與心靈狀態的一致性所決定。因此對於 Skinner 理論的批評不夠充分。

關鍵詞：Quentin Skinner、John Searle、語言—行動、意義、意圖／意向性

---

* 本文接受國科會補助，計畫編號爲 NSC 96-2414-H-034-007。對於二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也在此一併致謝。

** 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lyk2@faculty.pccu.edu.tw。

收稿日期：95 年 11 月 24 日；通過日期：96 年 8 月 13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Quentin Skinner 有關方法的理論源自於他對當時英國史學界的批判。Skinner 早期的若干研究是有關霍布斯的思想，[1] 因此他難免必須涉獵當時的相關著作。然而他對當時那些相關著作的研究方法與結論都十分不滿。Skinner 對那些對霍布斯理論的若干新詮釋途徑－特別是 F. C. Hood 的目的論（1964）、Howard Warrender (1957) 的本務論以及 C. B. Macpherson (1962) 的馬克斯式詮釋—尤感不耐（Palonen, 2003: 19）。這些有關霍布斯的新穎見解所追求的是理論當中的一致性，然而 Skinner 對這種研究歷史的態度卻無法認同。他曾經在一篇早期發表的文章中以略帶嘲諷的口吻指出，

> （在讀這類作品時）讀者的首要重點在於知悉如何依照更高的眞理（the higher truth）去忽視一些證據；對評論者而言同樣要緊的是要去解釋根據怎樣的基礎可以刪除那些與作者的「眞實」設計無關緊要的證據（Skinner, 1964: 322；轉引自 Palonen, 2003: 19）。

在 Skinner 看來，這些研究在方法上所顯露共同特徵，是對歷史證據的任意剪裁，這當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作法，因爲任何研究都必須從既有證據出發進行推論。然而這些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依照自己預先設想的結果來決定什麼可以或不可以被當成證據。然而這種研究模式是否適用於歷史研究？抱著懷疑的態度，Skinner 開始轉向另一種思維：一方面他界定歷史研究的本質不同於科學研究；另一方面，基於歷史研究的特殊性，在方法上應該更著重於「意義」（meaning）這個在自然科學研究中罕見的概念。出於這些考量，Skinner 開始運用所謂的「日常語言哲學」（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從事他的歷史分析，強調意圖（intention）與脈絡（context）對文本意義的影響。[2]

然而 Skinner 的方法論並非沒有質疑者。在哲學方法上， Keith Graham (1988) 質疑 Skinner 強調作者意圖決定文本意義的說法，認爲意圖似乎不

---

1 例如 Skinner (1964; 1965; 1967)。

2 Skinner 在這方面的著作可參考 Skinner(1966; 1967; 1970; 1971; 1972a; 1972b; 1974; 1988a; 198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扮演意義的充分條件。[3] 另外在應用此方法到歷史研究時，Joseph V. Femia (1988) 則批評 Skinner 似乎將歷史研究等同於恢復作者意圖，這意味著歷史研究相當於從事考據作者動機而已。[4] 類似的質疑也來自於 Keane (1988: 205) 的評論，他認爲 Skinner 對於意圖的強調讓歷史研究呈現出一種「作者—主體」途徑（'author-subject' approach）（Keane, 1988: 205）——意即文本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作者的意圖（cf. Kjellström, 1995）。對於這些評論 Skinner (2002: 109-111, 124-127, Ch.5) 本人也提出了反駁之意見。根據 Skinner 的說法，在這裡他所提出的見解是，「如果我們想要用一種真誠地歷史精神來書寫一本哲學史的話，我們需要將以下原則當成是首要任務之一，就是我們必須將我們所研究的文本置於那個可以讓我們理解這些作者在書寫（這些文本）時所要施行（的行爲）所處的智識脈絡（intellectual contexts）當中」(Skinner, 2002: 3)。這段話很精要地將 Skinner 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亦即作者語言—行動（speech-act）與智識脈絡——間的關係表達清楚：文本的意義可以透過這二種概念來重建。[5] 但是本文嘗試藉由另一個日常語言哲學家 John Searle 的看法來分析 Skinner 的意義理論，並回應上述的批評：透過 Searle 的理論，我們可以嘗試去找出 Skinner 意義理論如何將心靈與語言連結起來，而不是如 Graham 所稱應該將這二者區分。進而理解在分析文本意義時，爲何發掘作者意圖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另一方面，透過 Searle 對意圖與意義的分析，更進一步地釐清了 Skinner 的理論中意圖與脈絡在從事歷史研究時扮演的優先順序，而不是如 Femia 所說的歷史研究應著重在語意（semantic meaning）層面的一致性。

意圖決定意義？

Skinner 指出，對於思想史的研究而言，除了理解歷史文本(text)記載了什麼（what was written?）以外，另一個至少同等重要但是卻經常被忽略

[3] 相關的批評可另參考 McCullagh (1998: 150-155) 以及 Bevir (1999: 40-42)。

[4] 更進一步地評論請參考 Mandell (2000: 119-120) 與 Rée (1991: 978-980)。

[5] James Tully (1988) 就很恰當地採用了「意義與脈絡」（*Meaning and Context*）作爲他爲 Skinner 理論所編的評論集書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問題，是爲什麼作者要留下這樣的紀錄（why was it written?）（Tully, 1988: 9）。然而 Skinner 特別的地方並不只是強調後者的重要，他同時也對傳統思想史研究者如何回答第一個問題的方法有不同看法。Skinner 認爲要解讀歷史文本文意就必須將文本放回其原本的語言或意識型態脈絡（linguistic or ideological context）中，這裡所謂的脈絡指的是「在同一個時期中，針對相同或相似的議題並且共享許多常規（conventions）的文本的集合」，其中所謂「常規」指的則是完全或者至少部分能夠規範意識型態的人類慣習（Tully, 1988: 9）。Skinner 之所以主張文本必須置於脈絡中，是因爲他接受了某些日常語言哲學家的看法，認爲語言—行動的意義來自於常規，因此要瞭解語言—行動的意義的話，就必須先掌握環繞著該語言—行動的特定語言常規之中（cf. Skinner: 1972a）。

對 Skinner 而言，在回答第一個問題之後，思想史家立刻就要面臨第二個問題。一旦解讀出文本的文意之後，讀者就可以知道文本的作者寫作的目的是要接受或背書，抑或是要挑戰或反駁當時語言或意識型態脈絡中所預含的常規或假設（cf. Skinner, 1972a）。而 Skinner 認爲解答這個問題，如同某些日常語言哲學家（特別是 John Searle 與 H. P. Grice）所指出，其關鍵在於找出這些文本作者的意圖。因爲根據這些哲學家的看法，所有的發語不只是一句話而已，更是一種行動（act）的展示。如果把這樣的概念運用在思想史的研究（這正是 Skinner 所企圖要做的），可以發現當文本作者在著述其作品時，他或她其實正在從事某一種的實際行動，而不是書空咄咄而已。而作者透過文本所從事的語言—行動，事實上包含了二重的影響：在語言上，這種語言—行動回過頭來改變或鞏固了原本的語言或意識型態常規；在實際政治方面，這種語言—行動則是對既有的政治行爲進行意義上的重述（redescription）。[6] Skinner 認爲，唯有從語言—行動的角度切入，才能同時兼顧或回答前述的思想史文本的二大問題。

雖然 Skinner 運用日常語言哲學的方法，建立起一套政治思想的研究途徑，但是這樣的途徑卻受到了不少質疑。在關於意義理論方面，批評大致

[6] 這種重述可能是正面也可能是反面的，但這並不是一種解釋（explanation）。這種語言—行動並不是要說明一個既存的政治現實的成因爲何，而是重新賦予同一個政治現實一個不一樣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分爲二類。其中一個屬於哲學上的責難，就是質疑意圖是否能作爲意義的來源。Graham 就反對 Skinner 的語言—行動觀，他認爲 Skinner 的語言—行動理論的一大特徵就是 Skinner 似乎將意圖等同 illocutionary force，而又將 illocutionary force 等同於對行爲（behaviour）的意義（Graham, 1988: 147-149）。然而在他看來，這樣的見解並不妥當。首先，他認爲發語跟行爲是二個範疇，而不像 Skinner 的語言—行動理論所認爲的發語就是行動本身。在評論 Skinner 反對區別發語與行動，因爲這樣將無法回答發語者爲何要做出特定發語的說法時，Graham 指出：

> （按照 Skinner 的說法）由於我們希望對什麼（what?）跟爲何（why?）的問題維持個別的答案，我們將被迫對我們所關注的領域（對什麼跟爲何這二種問題）做出清晰的區分。但要注意（Skinner 這樣的）反駁意見其實是在呼應我稍早對發語及行爲所做出的區分並且承認我們只解釋了發語而已：我們知道了發語者爲何做出了他所做出的發語。Skinner 的說法也因此在這個面向要修正：找出 illocutionary force 是對發語，而不是對於行爲，的一種解釋模式（Graham, 1988: 150-151）。

除了切斷發語與行動之間的關係，Graham 更進一步地切斷意圖與發語間的關係，他指出我們有可能在缺乏適當意圖的情況下做出 illocutionary act。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在某種常規特別盛行的地方，當特定情況出現時一個人說出一句話就可能被認爲他把這句話當真——即使他並沒有這樣的意圖。「當一個打橋牌的人即便只是脫口而出『再賭倍』（redouble) 而不是真的意圖再賭倍時，在一個恰當的情況下，他就真的再賭倍了」（Graham, 1988: 152）。綜合上述的討論，Graham 認爲，以他自己的敘述來說明，就是從 (a) X 做出一個發語 U（例如 Jones 說「那兒的冰很薄」）到 (b) X 做出一個 illocutionary act I（例如 Jones 藉由上述發語做出警告）（Graham, 1988: 149）之間並不存在一種必然關係，(b)可以不需要預設(a)的存在就被完成。而(a)的意義也可以單獨存在而不需要預設(b)的存在，我們可以不需要(b)就能夠理解(a)。Graham 這裡對於意圖、發語及行動三者間做出全面的區分，他認爲 Skinner 將這些概念視爲三位一體的說法只有在某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類活動中被發現：

> 何以可能會有一個行爲者能夠成功地完成其所有若且爲若他所意圖去作的所有行動（a whole range of actions）？我們眞的那麼幸運嗎？進一步的省思會告訴我們並不，（也會告訴我們）基於各種理由一個人可能會做出一個其意圖去包含一種特別 illocutionary force 卻無法實現（materialize）（此一 illocutionary force）的發語（Graham, 1988: 151）。

換句話說，Graham 認爲 Skinner 的語言——行動理論即使不是完全錯誤，也只能夠適用於很少數的人類語言表達中——只有那些 illocutionary force 真正達成其 perlocutionary effect 的發語才合乎 Skinner 的要求。

另一個質疑則與思想史有關，亦即歷史研究是否要將文本意義限縮爲等同於作者意圖。在這個部分，Femia 曾對 Skinner 這些所謂的「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7] 的方法提出異議。他歸納出 Skinner 的五項主張：

1. 在政治／社會領域中沒有「永恆的問題」（perennial questions）；
2. 過去的思想必須置於其原本所處的脈絡下才能被理解，其本身並沒有獨立的意義；
3. 思想史學家不能以自己先入爲主的觀念（preoccupation）作爲詮釋過去的概念或文本的標準；
4. （文本的）史實性（historicity）存在於作者有意識的意圖中；
5. 任何思想在離開其原本的脈絡下的後續發展——尤其是那種時空錯置的詮釋——已經超越了作者原來的想像，使得作者本人（即使他有這樣的機會）將無法理解其理論後續發展的樣貌（Femia, 1988: 157）。

Femia 對上述所謂的 Skinner 的五個要點一一的反駁，而且他反駁的理由相當具有代表性。首先，對於第一點跟第二點，他指出人類具有極爲普遍的相似性，他稱之爲「不變的底層」（permanent substratum）。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會將這種有關人類本性與良善生活的本質（the nature of man

[7] 主要是指劍橋學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of the good life）的問題列入考慮。換句話說，至少在西方的傳統中，歷史研究的確存在某些普遍的問題意識。換句話說，所謂的沒有永恆的問題，指的只是對於這個普遍問題意識的不同形式（form）而已。如果因此就認爲說不同時空下的脈絡凌駕在這些普遍問題意識之上，顯然是不正確的（Femia, 1988: 164-165）。既然是如此，我們可以想像，在某個意義上，不同時代的人其實會有相同的關注，只不過關注的形式會不一樣。因此歷史研究的一大功能，就在於只要我們過濾掉歷史事件中一些受時空所限制的條件，留下的（用 Antonio Gramsci 的話來說）「剩餘物」（residue）就是人類永恆的關注，當然也會對不同時空下的研究者有幫助（Femia, 1988: 165-167）。

根據上面的描述，Femia 提供了一個對比的畫面：一方面 Skinner 認爲歷史因爲不同的脈絡而呈現不連續的狀態，因此不存在永恆的歷史問題。所以每個時代的思想家都有其獨特的關注議題，而這些議題同樣也是不連貫的。既然如此，我們如果要理解這些思想家的觀點，我們只能從他們的意圖著手，而不能以我們自己的意見去比附，畢竟意圖是不受脈絡侷限（context-free）的。而 Femia 反駁的論旨在於：Skinner 的立論出於歷史中不存在永恆議題，然而這樣的議題是確實存在於人類本性之中，因此歷史研究者在研究文本時理所當然地會從自己的立場去審度傳統理論。重點在於這樣做是合理的，因爲不同脈絡底下其實共享著相同的「底層」。

根據這個圖像，Femia 順勢對 4. 跟 5. 提出連貫的批評。他（正確地）指出 Skinner 其實並不反對我們做出回溯的（用他自己的話）「地域主義型」（parochial）研究，但是他認爲要以今測古去重建思想家自己沒有意圖建立的理論一致性至多是一種哲學性的工作，而不是文本中所具備的「歷史意義」（Femia, 1988: 173）。Femia 指出，Skinner 這樣的說法就不能成立，因爲思想家自己沒有意圖去找出其理論中的一致性，並不代表不可能存在這種一致性。此外，雖然思想家可能沒有意圖讓他的理論達成某種效果，但是他的理論在邏輯上（乃至於在歷史上）卻的確發生了某種影響。因此後來的歷史學家將這種潛在的一致性給挖掘出來並不是什麼不正當的研究行爲（Femia, 1988: 171-173）。換句話說，如果 Skinner 把文本的意義侷限在作者意圖上，那他顯然會無法解釋何以文本會有如此豐富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義：就是歷史上會有那麼多思想家有意識的意圖以外的結果。Femia 的批評可說是對 Skinner 式歷史意義理論的典型批判。[8] 在本文裡，焦點會集中在意圖與歷史意義跟歷史研究的關係上。Femia 的主要論點是：歷史文本對後世的人而言，其意義會超越作者意圖。而這樣的超越並不離譜，畢竟所有的歷史問題是出自於同樣的人性。

雖然 Graham 或是 Femia 的批評分別來自哲學與思想史方法二個不同層面，然而二者卻享有共同的交集：他們都認爲 Skinner 的方法論似乎錯估或者高估了意圖對於文本意義的影響。在評估這樣的批評是否允當之前，我們先回到 Skinner 的理論本身，看看他如何去論證意圖如何決定意義。

Skinner 論意義

前面提到，Skinner 認爲，與其他學科相比，歷史研究的特殊之處在於歷史研究必須要考慮到意義這層概念。在此，他首先指出，傳統上所謂的「意義」主要由陳述句（statements）跟所被陳述的事實（facts）間的正確對應關係來決定，而持這種見解最力的就是實證哲學（positivistic philosophies）（Skinner, 2002: 2）。可是，受到後來的後期維根斯坦所啓發的日常語言哲學的影響，Skinner 認爲這種對「意義」的傳統解釋可能不足。他最早借用了 H. P. Grice 的用法，區分所謂的「意義」其實有二種：「自然的」（natural）與「非自然的」（non-natural）（Grice, 1957）。二者的差別在於後者的意義來自於發語者的意圖，而前者的意義則著重在原因與效果（cause and effect）間的關係，與發語者的意圖無涉。舉例來說，「狗是一種動物」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自然的，因爲「動物」是一種獨立於人類生活的存在類型；但是說「狗是一種寵物」時其中的意義就是非自然的，因爲「寵物」這個概念依賴於人類所建構的社會價值：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人類社會，那麼任何一條狗只能是一條野狗，而不能是（人的）寵物。若我們接受這樣的區分，就很容易聯想到 Skinner 會得到何種推論：實證主義式只認可「自然的」意義。然而問題在於歷史是有關人類

[8] 相關的批判，請參見 Keane (1988); Gunnell (1982); LaCapra (198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動的研究，而人類活動顯然不僅包含「自然的」意義，更包含了大量了——甚至絕大多數都屬於——「非自然」的意義。在這種情況下，Skinner 就反對那些以事實爲取向的歷史研究（Skinner, 2002: Ch. 2），並且從此延伸出歷史研究中「解釋信念與真理這個概念無關」（Skinner, 2002: 2）的觀點。[9] 在這裡 Skinner 捨棄了實證哲學所信仰的 correspondence theory，而接受某種 coherence theory——亦即意義並非來自陳述句與事實間的真實對應，而是取決於陳述句與其他陳述句間的關係。也因此 Skinner 自己聲稱他「接受我們在 Quine，Davidson 和尤其是後期維根斯坦哲學中所遭遇到的那種全體主義（holism）」（Skinner, 2002: 4）。

捨棄實證主義「自然的」意義的結果，除了連帶捨棄其所蘊含的 correspondence theory 之外，還讓 Skinner 對「意義」的見解改換至另一個方向。當他宣稱「真理」在研究意義時不具有實證哲學所宣稱的重要性時，他轉而接受後期維根斯坦的說法：一個陳述句的意義並非來自於該陳述句爲真，而是來自於其用法。這種意義的使用理論（the use theory of meaning）隱含著一個假的陳述句仍然能夠被理解的可能。[10] 尤有甚者，既然歷史研究中所處理的大多數是「非自然」的意義，而這類陳述句的真假值顯然不是「自然的」或客觀存在的，那麼強調真理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顯然沒有太大的意義。在接受上述說法的前提之下，Skinner 所要解決的問題，顯然就是要如何去分析歷史研究中所充斥的包含「非自然」的意義的陳述句。針對這個狀況，Skinner 採用了日常語言哲學的方法。

大體而言，Skinner 所運用的是 J. L. Austin 以來的日常語言哲學，其中他較常提及的還包括 Grice (1957) 等人。Austin 是牛津日常語言學派的

---

9 有關 Skinner 論眞理與歷史的關係，可見 Taylor (1988) 的批評。至於 Skinner 的回應則見 Skinner (1988a; 2002: Ch. 3)。

10 維根斯坦用了一個很生動的譬喻來說明這種現象。想像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可以被用來飼養甲蟲的盒子。我們當中的某些人可能在他的盒子裡養了一隻甲蟲、有些可能養更多、甚至有些人的盒子是空的。但是不管情況如何，我們都可以互相討論我們所飼養的甲蟲（即使有人實際上並沒有飼養）。也就是說，不管甲蟲是否實際上眞的存在，都不會妨礙我們談論它們的能力（Wittgenstein, 1958: 293）。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論點，因其有效地說明了何以不爲眞的命題（例如神話或者謊言）仍能被我們所運用或理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鼻祖，將語言視爲一種行動的見解就是由他開始。[11] 然而由於 Austin 早逝之故，他的理論依然保留著十分粗疏的原始結構。Austin 指出要理解發語者的 illucutionary act 需要充分理解其語言常規，他後來甚至認爲是這種語言常規，而非作者意圖，才是決定 illocutionary act 意義的關鍵（Austin, 1975: 128；Skinner, 2002: 105-106）。然而 Skinner 對這樣的解釋並不滿意，因爲正如前面所說，Grice 很明確地指出了「非自然的」意義的存在。也就是說，Austin 的這種減低語言—行動中作者意圖的說法，似乎沒辦法作爲理解「非自然」意義的方法。這個問題要到後來 Peter Strawson 進一步將 Grice 的意義理論與 Austin 的語言—行動理論作了某種程度的整合之後，Skinner 才認爲獲得了解決（Skinner, 2002: 133；Skinner, 1970）。[12] 簡單地說，他認爲 Grice 成功地解釋了何以要理解一個（尤其是帶有「非自然」意義的）語言—行動的關鍵就在於理解發語者的意圖（Skinner, 2002: 2）。雖然在他的眾多著作中，Skinner 並沒有給「意圖」這個概念一個直接而清晰的定義。[13] 然而從以上討論的脈絡中，我們至少可以知道 Skinner 是傾向接受 Grice 對「意圖」的界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論及「意圖」時，Skinner 做出一種比較細膩的分析。首先他先論證意圖與動機（motive）之間的差別。在一般的日常用法中，甚至對於某些哲學家而言，這二者幾乎是同義詞（Skinner, 2002: 138）。但是就語言—行動而言，二者之間存在著很重要的區別。動機跟意圖對語言—行動來說，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在語言—行動之外，而後者則包含在其中（Skinner, 2002: 97-99, 131-139；梁裕康，2006：112）。當論及動機時，一般會先聯想到的是行爲者的存心是否出於一種善意；另一方面則是會聯想到動機必然與某種目的相關。簡單地說，動機中包含的目的（不論是出自善意或惡意）就是觸發行動的理由。然而在 Skinner 的理

[11] 此部分可參見 Austin (1975) 的著作。在本書中 Austin 將語言所表達的意義分爲 locution、illocution 與 perlocution 三層次來分析。此書應算是日常語言哲學的起點。

[12] 另外 Skinner 如何補充 Strawson 的理論請參見梁裕康（2006：103-106）。

[13] 但這並不代表 Skinner 都沒有論及「意圖」此一概念本身或者如何運用此一概念。在稍後本文將會處理此部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中，關於行爲是否出於善意的這類心理狀態判斷對意義是無關的，[14] 因此動機對於理解意義而言並不重要，Skinner 也因此將動機排除在理解語言—行動的條件之外。[15]

但是即使區分了動機與意圖，還有另外一個問題。所謂的「理解」（understanding）跟「解釋」（explanation）意義之間是有所不同的，而正是這點構成了歷史研究（乃至於所有有關於人類社會研究）的特徵。Skinner 之所以會做出這樣的推論，是因爲他認爲意圖在歷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被過份忽略，而造成這種結果的部分原因在於「對行動與環境間的關係的本質有著根本的錯誤」認識（Skinner, 1988b: 59）。此處 Skinner 表現出對於純粹的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文本意義完全取決於文本脈絡——忽視意圖的作法有所批評。爲了說明這點，Skinner 對於意圖這個概念做出了更細膩的區分。他指出在這類型的脈絡分析之下，讀者所尋求的是解釋造成行動的原因（cause）爲何。也就是說，一旦找到了原因，解釋也就完成。然而這種解釋模式似乎忽略行動哲學（philosophy of action）所要處理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什麼東西可以引發人的行動。這裡可以用個例子來說明：臨床上已經證實吸煙是一種有害健康的行爲，但是我們仍舊可以

---

[14] 這點 Skinner 並沒有著墨太多，但是本文稍後會回來處理這點。

[15] 第二位審查人特別指出：Skinner 區別「意圖」與「動機」似乎是一種不成功的嘗試。原因是一方面他無法說明何以獨厚前者而排除後者能引發人類行動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也無法說明爲何後者不若前者那樣跟人類心靈緊密連結。

然而 Skinner 似乎並沒有落入審查人的指控當中。Skinner 並沒有否認「動機」與「意圖」一樣，都是一種心靈活動。他甚至也沒有否認其他的心靈活動（例如審查人所例舉之「情感」或「偏好」）都可能引發人類行爲的「動機」。Skinner 眞正要強調的重點在於：在一次成功的語言—行動之中，這二者所發揮的功能並不相同。「動機」當然是引發人類行動（不管是否爲語言—行動）的原因，但是賦予語言—行動意義的（或者更精確地說，將 illocutionary force 注入語言—行動的）卻是「意圖」。這也是爲什麼 Skinner 要特別強調「意圖」是包含在行動之中、而「動機」卻是在行動之外的心靈狀態的理由。舉例來說，就好像馬基維利或許出於各式各樣的「動機」（例如他可能只是自己想重返仕途，而不是出於什麼愛國情操）寫了「君王論」獻給 Medici 家族。但是作者在「君王論」這個文本中所展現出的意圖（例如「君王應該知道在什麼時候要行惡」（cf. Prince: Ch. XV）），卻跟其「動機」毫無關連。也就是說，對 Skinner 而言，要回答「why was the text written?」的問題，就得跟理解普通的語言—行動一樣，必須去理解作者的「意圖」而非其「動機」。相關的討論請參考梁裕康（2006：1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現，很多吸煙者在知道這種臨床發現的前提下，卻不願意戒煙。根據前面的解釋模式，吸煙者有著充分的原因去戒煙，然而戒煙這種行爲卻沒有發生，因此結論是這些持續吸煙者不夠理性或者失去自主性（因爲已經成癮）。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發現，在原因與行爲中間，確實還存在著其他因素來促使或阻止人們從事某些行動。而根據前面的描述，我們可以發現 Skinner 基於語言—行動理論，認爲意圖就是那個可以觸動人類行爲的因素。他進一步指出，脈絡主義將理解等同於找到原因的說法過於簡陋，因爲如果說理解預設著去掌握出現在行爲之前的因果條件（antecedent causal conditions）（也就是去找出原因），那麼理解也必須預設著去掌握行爲者做出行爲的主旨（point）——也就是所意圖要達成的目標（what is intended to achieve）。脈絡主義下的解釋之所以忽略後者，是因爲這些學者所關注的例子都是沒有主旨或主旨可以被省略的簡單行爲，像爲什麼「一個人穿上外套」的狀況，而不是爲什麼要「撰寫伊里亞得（*Iliad*）」這種需要理解作者意圖的例子（Skinner, 1988b: 59）。

綜合前面的討論可知，Skinner 認爲所有的語言表現（包括歷史文本的書寫）都是語言—行動，而要理解這些語言—行動的意義，不能只是追求原因的解釋，而是要包含對當中意義的理解，而對於意義的理解當然必須包括發動語言—行動的行爲者（也就是歷史文本的作者）的意圖的分析。但是 Skinner 也進一步指出了「解釋」與「理解」的差異之處，這點也構成了他所認爲的歷史研究的獨特點。在「解釋」的模式中，原因必然先行於行動之前，因此二者是個別的存在。而所要解釋的就是什麼原因促成了行動的發生。但是在所謂的「理解」當中，這種原因與行動個別存在的情況並不必然會發生。Skinner 特別在此處區分了「欲做某事的意圖」（intention to do *x*）與「包含在做某事中的意圖」（intention in doing *x*）（Skinner, 1988b: 60）。[16] 這二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對一件還沒發生或完成的行動之動機，而後者則是在已經完成的行爲中的動機。舉例來說，[17] 一個警察知道有個

[16] 後來 Skinner 將後者重述爲「包含在做某行爲中的意圖」（intention in *xing*），因爲 'intention in acting' 比 'intention in doing *x*' 更能表達出意圖與行動的關係（Skinner, 2002: 98-99）。之後文中將對 'intention-to-do' 簡稱爲 I_1，'intention-in-acting' 爲 I_2。

[17] 借用並改寫 Strawson（1964）所舉的例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湖剛結冰不久，因此湖面的冰很薄，站在上面很危險，因爲可能冰層還無法承受一個人的重量。假設這時他發現有個人在上面溜冰。根據他的瞭解，他知道這是一個危險的舉動，因此他想幫助這個人避開這個危險的後果（這是警察的動機），因此他會有個念頭要出聲警告那個溜冰者（這是該警察的 I_1）。接下來會出現二種可能的狀況。一個是那個溜冰者毫無警覺地繼續在湖上溜冰，這時很快地這位警察就做出一個語言—行動，對著那個溜冰者高喊「那兒的冰很薄！」（The ice over there is very thin!）。在這個語言—行動中，這個警察展現出一種帶有 I_2 的 illucutionary act，亦即這個意圖包含在這個語言—行動當中，二者是不是先後出現而個別存在的。另一種可能是，溜冰者自己察覺不對勁，立刻就上岸不溜了。在這種情況下警察還來不及做出他要發動警告的語言—行動，需要被警告的事態（the state of affair）就已經消失，因此他帶有 I_2 的語言—行動也就沒有發生的必要—或用 Skinner 的話來說，就沒有做出這個語言—行動的「要旨」（point）了。Skinner 接下來指出，

> 所有已經被做出的陳述或者其他已經被履行的行動必然預設了要做這些事的意圖——如果你願意你可以稱之爲原因——而且還會包括了那種不能被稱之爲原因，但是如果要正確地描繪以及理解這些行動時必須要掌握的，包含在做這些行動中的意圖（Skinner, 1988b: 61；underline added）。

換句話說，任何一個成功的語言—行動應該包含了動機以及 I_1 和 I_2 雙重意圖。從這裡 Skinner 推出二個結論，一是歷史研究是要放在帶有 I_2 的語言—行爲中（Skinner, 1988b: 60-61；Palonen, 2003: 43）。畢竟歷史研究所要研究的是那些已經真實發生過的事件（或者更精確地說應該是成功的語言—行爲）。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推論，則是歷史研究要側重那種非因果式的解釋，因爲因果式的解釋忽略掉人類行爲中某些特別的面向。[18] 值得注意的是，因爲 Skinner 對於 I_2 的強調部分原因是來自前述的對純粹的脈絡主義解釋模式的批評，因此常會給人 Skinner 反對脈絡在進行理解中

[18] 有關這方面的細節討論，參見 Skinner (2002: Ch.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具有重要性的印象，然而這個說法應屬言過其實。事實上，至少到了近期，[19] Skinner 認爲由於他的理論對文本脈絡的重視，因此「他所描繪的研究途徑會將作者的傳統形象置於極爲不良的狀況應該是很明顯的」（Skinner, 2002: 118）。[20] 正確地說，Skinner 所要做的是某一種的補充，也就是除了傳統脈絡主義中的解釋模式之外，從事歷史研究還必須要對作者所做出的語言—行爲中的意圖進行理解。

然而即使這些關於語言—行動的討論都有道理，Skinner 所要面臨的一個問題是：這些語言—行動都是侷限在日常對話的個人發語 （utterance）層次，但是歷史研究所要處理的卻是集體的社會行動，這些正是歷史研究的獨特之處。Skinner 根據上述的方法，對此提出了一個研究歷史的獨特模式：

> （從事歷史研究所要遵守的）訓令是歷史性地思考，不是著重於對個人之個別行爲的解釋，而是在於解釋在相關的社會脈絡中環繞在這些行爲被做出的常規。要認識什麼是常規的不僅限於理解爲了做出一個行爲被自我有意識地遵守的常規。需要相關地被認識的還包括更廣泛理解對特定文化中已經確立之假設與預期。我們需要的不是從研究社會規範脈絡中去回復（recover）行動者的動機，而是藉由將他們的行動置於一個更大的價值與實踐體系中去解讀（decode）他們的意圖（Skinner, 2002: 142）。

也就是說，Skinner 真正的論點並不是僅僅要知道作者動機的內容是什麼，更重要的是這些動機與其所處的脈絡間的關係。一來是因爲基於他的全體主義，除非參照其脈絡，否則動機本身的內容難以理解。再者，更重要的是，光研究動機而不研究意圖與脈絡的關係，我們無法理解作者寫作的「要旨」——意即該語言—行動中的意義。或者換句話說，歷史研究的對象並非文本作者，而是文本作者作爲一個行動者，透過他或她的語言—行動，對於社會脈絡所造成的影響，才是真正的重點，也是歷史研究—或

[19] 他自承他已經軟化了早期有關他對語言—行動中的意圖的若干過度推論（Skinner, 2002: 3）。

[20] 有關 Skinner 對於脈絡在分析文本意義時的重要性，請見 Skinner（2002: 114-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精確地說概念史（the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有別於其他學科之處。

以上的討論嘗試去描述 Skinner 的意義理論。從日常語言哲學出發，Skinner 將語言—行動中所展現的作者意圖視爲理解意義的必要條件。接著他更從此出發，推論不僅個人日常語言發語層面的意義必須如此掌握，即便是社會行爲層面的意義也是如此。二者間的差異在於後者更需要將社會脈絡置於理解意義的架構中。透過這樣的模式，Skinner 完成了他認爲歷史研究的真正議題，在於研究作者意圖與其所處的社會脈絡間的互動關係。

然而 Skinner 的解釋是否真的能回應批評者對其理論的質疑，特別是意圖與意義間的關係？更具體來說，Skinner 認爲作者意圖是決定語言—行動意義的必要條件之一，而脈絡一方面則是提供文本作者從事語言—行動的資源，一方面也提供了讀者去理解（uptake）其意義的條件。這樣的說法似乎是將意圖與脈絡看做是二個個別獨立的概念，而語言—行動的意義則是這二者互動下的結果。然而 Skinner 卻又聲稱「運用這種研究途徑的結果……就是去挑戰所有對文本跟脈絡間的範疇區別」（Skinner, 2002: 117）。換句話說，Skinner 並不認爲意義是由意圖跟脈絡間的交互作用所決定，因爲這二者間並不存在清楚的區別。首先一個陳述句的意義還是受其字面上的意義——尤其是文法語氣（grammatical mood）[21] ——所限制，因此不可能由作者意圖做出天馬行空式的推演（例如警察高喊「那兒的冰很薄！」不可能是對溜冰者的質問（questioning））（Skinner, 2002: 114）。文法結構乃至語言整體一般而言都被視爲脈絡的元素之一，因此作者意圖的表達方式甚至內容受到脈絡限制是無庸置疑的。其次，任何的語言—行動都屬於一個更大範疇的論證，而不只是個別命題的串連（strings of propositions）而已，意即每個語言—行動都要從一個整體主義（holistic）的角度去評估其意義，而不能只單單考慮其字面上的意涵（Skinner, 2002: 115）。

雖然 Skinner 確實指出了意圖跟脈絡之間存在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是這樣的解釋似乎無法如同他所宣稱的足以證明文本與脈絡存在一種無縫隙的關係。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Skinner 就必須很清楚地告訴我們：究

[21] 文法語氣所描述的是動詞與實際狀況跟意圖間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竟意義的來源是作者意圖還是脈絡，而不能採取上述的折衷說法，認爲意義是由二者的交互作用所決定。既然如此，接下來的問題在於：要如何將意圖、脈絡、意義這幾個概念統合成爲一個整體？對於這個問題，Searle 的理論或許能夠提供一個很好的參考：藉由整合心靈、語言、以及社會實體之間的關係，Searle 的理論在某種程度上替 Skinner 指出了如何整合意圖、脈絡、以及文本對讀者所昭示的意義。

Searle：意向性與語言—行動的對應關係

當 Skinner 運用語言—行動理論來進行分析時，他強調意圖在語言—行動中的重要性，在這方面 Grice 比 Austin 對他的影響更大（Skinner, 2002: 2）。然而在哲學分析中，意圖與語言常被視爲分屬不同層面的問題，前者與心靈哲學（philosophy of mind）有關，後者則與語言哲學有關。在 John Searle 的理論中，他提出了對 Grice 理論的某種修正，並指出心理狀態與語言—行動存在一種平行關係。這些特點讓 Searle 的理論能對 Skinner 的方法論提供一些反省的基礎。Searle 的理論更能夠說明爲何文本與脈絡之間的界線是可以消除的，而意圖與脈絡的關係也能更清楚的表達。因此接下來的部分要先討論 Searle 如何建構意圖或心理狀態與語言—行動間的關係。[22]

要討論 Searle 如何去理解語言—行動這個概念，不免得從他的心靈哲學談起。乍看之下這似乎有些牽強，然而這是卻是一個必要的起點，因爲稍後我們就會看到，對他而言語言—行動理論中的核心概念「意向性」

[22] Searle 理論的建構過程大致可分爲三個階段：speech-act，mind 以及 social reality。其代表作分別爲 1969、1983 以及 1995。然而這三個階段並非各自獨立的不同領域，因爲 Searle 最終所欲達到的結果是消除 physical reality、mental reality 以及 social reality 之間的界線，亦即只存在一個 reality。從理論的結構上，從最基礎到最接近人類生活現狀的部分應該是從心靈哲學經由語言哲學再到他的社會實體。但是這個理論結構與他實際上發展理論的時序不同。這是因爲在他的養成階段時期，牛津當時的哲學發展還是以 Austin 與 Strawson 等人的日常語言哲學爲重，因此 Searle 很自然地也是從這方面開始他的研究。在本文以下的討論中，將依循理論結構而非其發展歷程來討論 Searle 的理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ntionality）被歸爲一種心靈而非語言上的特徵。[23] 他說：

> 我處理語言問題的途徑背後的一個基本假設是語言哲學是心靈哲學的分支之一。語言行動用來反映（represent）眞實世界中的對象（objects）或事態（states of affairs）的能力來自於心靈（或大腦）透過一些心理狀態像是信念（belief）或企求（desire），尤其是透過行動（action）跟知覺（perception），將（人類）有機體連接到眞實世界的這種從生理上看來更爲基本的能力（Searle, 1983: vii）。

這種說法較以往的語言—行動理論向前推進了一步。在以往的理論中，雖然理論家們（包括 Austin、早期的 Searle 本人乃至於 Skinner）雖然都意識到意圖這個概念的關鍵地位。但令人意外的是，在他們的理論中，他們仍停留在使用這些關鍵概念在一般日常對話中語言哲學上的意義，而沒有更進一步地分析其在心靈哲學上的位置。Searle 後來自陳這樣的作法如同「向銀行貸款」一般（Searle, 2002: 7），遲早都要還債一般，這些基本概念最終仍須回過頭來討論的。然而除了這個理由以外，Searle 更與維根斯坦式的語言觀產生分歧。在這類的看法中，像是「相信」、「企求」等動詞並不是真正的在描述某種心理狀態，而是在展現語言中的某些功能。[24] 但是 Searle 卻認爲這些動詞的確是在描寫某些心靈的狀態。[25] 在這

---

[23] 在 Searle 的早期著作中，都用大寫的 Intentionality（意向性）一詞來表達一般語言—行動理論中的 intention（意圖），因爲前者指的是泛指某一種心理狀態（psychological state），而後者被他認爲只是前者的眾多形式之一。然而在稍後的著作中，Searle 卻沒有那麼嚴格地去遵循這樣的用法。在本文中此一區分仍會被遵守。

[24] 維根斯坦將語言比喻成工具箱，認爲語言其實可以執行各式各樣的不同功能，就如同工具箱中的各種工具具有不同的用途一般（Wittgenstein, 1958: 11）。

[25] 有關心靈哲學的一個議題就在於人類是否存有所謂的心靈？例如一隻學舌的鸚鵡是否代表它跟人一樣會說話？如果不是的話，差異何在？維根斯坦式的語言觀雖然未必會否認心靈的存在，但是至少把心靈的活動跟語言的活動分離了，因此理解語言意義是一個無涉心靈的過程。這種概念可以用 Alan Turing 的 Turing Test (Turing, 1950) 來做說明。在這個測試中，Turing 認爲若機器能成功地模仿人類智能活動，就代表機器擁有人類智能。例如當我們問一隻鸚鵡「一加一是多少？」時，如果它會回答「二」，我們就能視這隻鸚鵡（跟人一樣）「懂」什麼是加法。Turing 的概念就是後來的「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裡 Searle 的研究所關注的不是意向性與語言的關係，而是心靈要如何被理解或研究的問題。這方面的研究後來延伸到他對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分析。

至於何以 Searle 會認爲語言哲學是心靈哲學的一個分支？這就要從他如何去看待心靈活動來分析。他首先要問的是心靈活動的性質爲何？其次要處理的是語言活動若是心靈活動的延伸，那麼二者間又存在怎樣的關係？針對這二個問題，Searle 給了一個一致的回答。簡單地說，就是心靈活動是一種意向性的活動，更重要的是，意向性是一種本質上固有的（intrinsic）的活動。此外，意向性還包括了若干特徵，而這些特徵大體上平行地跟我們的語言—行動相對應。也就是說，語言活動完整地反映（represent）了我們的心靈活動，因此語言活動派生自（derived from）我們的心靈活動。這樣的平行對應關係說明了語言與心靈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那麼到底何謂「意向性」？Searle 先給了一個初步的（*prima facie*）定義：意向性就是「指向性」（directedness）。

> 作爲一個初步的陳述我們可以說：何謂意向性是指許多心靈狀態或事件（mental states or events）中導向或者關於或者屬於（directed at or about or of）眞實世界中的對象（objects）及事態（states of affair）的一種特徵（Searle, 1983: 1）。

除此之外，Searle 還指出意向性的其他特徵。其中之一是，雖然意向性是心靈狀態指向存在於真實世界中的對象或事態的一種情況，然而並非所有的心靈狀態都具有指向性，因此並非所有心靈狀態都具備意向性。例如有人說「我相信……」（I believe that...）時，必然要有個對象或事態讓說這句話的人來相信。但是當有人說「我覺得痛」（I am in pain）的時候，痛就不帶有指向性。[26] 因此 Searle 說「在我的看法中若有一個（心靈）狀

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的始祖。但是 Searle 反對這種說法。在他的 Chinese Room Argument 中，他指出智能的運用必須預設某種心靈活動（Searle, 1980）。

[26] 在論證所謂的「隱私語言」（private language）時，維根斯坦指出我們可以理解別人懷疑我們自己感到（我們自己的）疼痛，但是卻無法理解自己懷疑自己是否感到疼痛這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態 S 是意向性的，那必然會存在像是『S 是有關什麼（的心靈狀態）？』（'What is S about?'）或『S 是屬於什麼（樣的心靈狀態）？』（'What is S of?'）或『作爲（某種心靈狀態）的 S 是什麼？』（'What is it an S that?'）這類的問題」（Searle, 1983: 1-2）。除了意向性只存在於某些心靈狀態之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些意向性狀態（Intentional states，以下簡稱 IS）並不是一種行動（acts），因爲「行動是一個人所做出來的事（things one does），而對於『你現在正在做什麼？』的答案不可能是『我現在正在相信快下雨了』（I am now believing it will rain）」（Searle, 1983: 3）。他特別強調，意向性狀態（如相信、害怕或擔心、希望、企求等）都不是一個行爲者所做的事，而就只是一種狀態或事件而已，這是意向性裡面很重要的特徵。因爲心靈狀態要變成具體行動，在 Searle 看來，正是意向性狀態與語言—行動間的連結。換句話說，語言—行動是意向性狀態的具體行動表現之一。[27]

那麼意向性狀態與語言—行動（speech acts，以下簡稱 SA）之間的關係爲何？Searle 認爲二者間存在一種相對應的平行結構：

1. 一個 SA 可以分成 illocutionary force 與 propositional content 二個部分，同樣的一個 IS 也能分成 Intentional or representative content 跟 psychological mode 二部分。比如說一個 SA「I order you to leave the room（我命令你離開這個房間）」相對應的 IS 是「I believe that you will leave the room（我相信你將會離開這個房間）」。在這個 SA 中的 propositional content (that you will leave the room) 跟其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 (ordering)，可以對應到 IS 中的 representative content (that you will leave the room) 跟 psychological mode (believe)。

疑問。原因在於痛覺不是一個可以被自我所懷疑的知識對象，所以我們對自己的疼痛只能說「我疼痛」(I am in pain)而不能說「我知道我疼痛」(I know I am in pain)。(Wittgenstein, 1958: 246）。Searle 在這裡也接受維根斯坦的見解，將某些感覺（例如痛覺）當成不指向任何對象（即沒有指向性）的心理狀態。

27 帶有意向性狀態的行動當然不一定會以語言方式來表達，例如一個人有一個想去慢跑的意向性狀態，他／她可能會做出一個承諾或約定式（commissive）的語言—行動（即告訴他人「我待會要去跑步」，或者他/她也有可能什麼都沒說，時候一到就逕自去跑步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 SA 跟對應的 IS 都能夠具有所謂的「符合方向」（direction of fit，以下簡稱 DF）。IS 有二種可能的符合方向，分別是「從心靈到世界」（mind-to-world）和「從世界到心靈」（world-to-mind）。所謂的符合方向指的是一個 IS（例如信念）是以某種方式去符合獨立於人而存在的眞實世界，而後者則是相反，不是要讓心靈狀態去符合既存的世界，而是要讓世界做出某種改變來符合 IS。同樣地在 SA 中也能找到相對應的 DF，分別是「從言語到世界」（word-to-world）跟「從世界到言語」（world-to-word）。值得一提的是，並不是所有的 IS 與 SA 都帶有 DF，有些是不帶任何符合方向的，而有些則可能是雙向的。
3. 帶有 DS 的 SA 與 IS 都具備了所謂的「滿足條件」（conditions of satisfaction）。例如在一個帶有命令的 illocutionary force 的 SA 中，當這個命令被遵守時，我們可以說這個 SA 被滿足了。同樣地在相對應的 IS 中，當其中的所被相信的是眞的發生時，我們也可以說這個 IS 被滿足了。Searle 指出「對每個帶有符合方向的語言行動來說，語言行動會被滿足若且唯若其中所表達的心理狀態被滿足，以及語言行動與其中所表達的心理狀態是一致的（identical）（Searle, 1983: 10-11）」。

從以上的對比，大致上可以看出 SA 與 IS 所謂平行關係的實質內容：IS 是由帶有某些心理狀態的 representative content 所構成，IS 以跟 SA 相似的形式反應（represent）了對象與事態。最後，IS 以其 representative content 跟 DF 決定其滿足條件，而 SA 以其 propositional content 與 DF 決定其滿足條件。

如果 Searle 結識了 IS 與 SA 具有平行而對應的結構，接下來的問題是心靈如何可能將意向性置入像聲音或符號這類本質上非意向性的物理現象，讓這些現象能表達出意向性（Searle, 1983: 27）？這個問題之所以對本文的討論有關，在於這個問題等於是在問「（文字）意義的來源爲何？」一般。根據前面的分析，Searle 認爲語言反映（mirror）我們的心靈狀態。此外，如同前面提到的，由於意向性是一種本質上固有的現象，而語言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是從意向性派生而來的。[28] 我們就會得到以下的推論：SA 中的意義是來自於其對意向性的反映。這個結論事實上呼應了自 Austin 以來對 illocutionary force 創造意義的說法。Searle 提出這個問題的重點在於：是否存在什麼過程或機制來產生（SA 中的）意義？換句話說，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形式正是前面所提的意義的來源，或用他自己更典雅的說法，「問題是在發語（utterance）行動中的意向性設定了怎樣的滿足條件可以賦予它們（發語）語意上的屬性（semantic properties）？」（Searle, 1983: 163）

Searle 認爲這個問題的解答在於 IS 與 SA 的結構上。他首先指出實際上存在二個層面的意向性。舉例來說，當我做一個陳述「It is raining.（現在正在下雨）」時，我會有一個意圖去發出（utter）這個陳述句。但是若我不只是要說出這個陳述句（say it），而且我也的確意指此陳述句的內容爲真（mean it），我這時還會有另一個關於信念的 IS（即我相信現在正在下雨，或者說我相信我做的陳述句「It is raining.」爲真）。換句話說，當我做出一個陳述而且也相信其爲真時，我必須同時滿足這二層意向性（即在 SA 與 IS 中）的滿足條件（Searle, 1983: 26-28, 163-164）。更特別的是，當我做出一個陳述而且也相信其爲真時，代表著 IS 的滿足條件成爲 SA 的滿足條件之一——也就是說，成功的 SA 必然包括成功的 IS（Searle, 1983: 164；2002: 9）。Searle 分別稱這二重意圖爲「真摯條件」（sincerity condition）與「意義意圖」（meaning intention）（Searle, 1983: 164）。而當都被滿足時，我們就可以說這個發語的意義，在於其成功地反映了這二重意圖的被成功地滿足的滿足條件。

此處 Searle 提出了「意義」此概念的一個重大特徵。Grice 的非自然意義與他自己的意義理論的區別，在於雖然 Grice 對意義的定義跟他一樣都依賴意圖這個概念，但是 Grice 認爲意義的來源不是他所認爲的反映心理狀態，而在於發話者透過對特定受話者有意發出的發語、並意圖在受話者身上產生若干效果（Grice, 1957: 377-388）。然而 Searle 認爲 Grice 的意義理論忽略了一種狀況：就是如果意義指的是對心理狀態的語意（semantic）反映，那麼發話者其實未必存有在受話者上產生若干效果的

[28] 可參考 Fotion (2000: 104) 中有關 linguistic turn 的討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意圖，而純粹只有反映其心理狀態的意圖（Searle, 1983: 165-166）。換句話說，Grice 的「意義」理論其實並非有關意義的理論，而是有關「溝通」（communication）的理論（Searle, 2002: 8-9），因爲只有在溝通的情境中，我們才需要講究發語所造成的效果。就某種意義來說，傳統的語言—行動理論——尤其是從 Grice 出發的理論——大抵都應從溝通的角度來分析。

在論及溝通的部分之後，Searle 的理論就稍微遠離心靈哲學、轉而與他最早涉入的語言哲學部分相連結。延續著對 Grice 的修正，Searle 提出意向性在 SA 的溝通功能裡其實也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 從說話者的角度來看，說一件事（say something）並且認眞看待此事（mean it）其實與企圖對聽話者產生特定效果是緊密相關的。從聽話者的角度來看，理解說話者的發語跟識別出他的意圖是緊密相關的（Searle, 1969: 48）。

也就是說，在運用 SA 進行溝通的過程中，事實上是有二組意向性在同時作用著。一是發話者想對受話者引發某種反應，一是受話者也必須有一個意圖去知道發話者是否正在跟他對話（Searle, 1969: 48-49；Fotion, 2000: 20-21）。

除此之外，Searle 還指出 Grice 理論中的另一項缺陷。Searle 認爲 Grice 只強調溝通過程中意圖的作用，卻沒有注意到（語言）規則（rules）與常規（convention）的重要性。他很正確地指出，在溝通的過程中，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的意圖要能達成一致，通常是在某種受規範的情況下才能達成。例如 Sam 對 Henry 說「It is raining」時，如果 Henry 不懂英語，那麼上述的溝通過程將會失敗，亦即發話者與受話者的雙重意圖都無法被滿足，因此 Sam 將無法對 Henry 引發他所意圖引發的效果（告知他天氣的狀況），而 Henry 也無法進入溝通的過程，因爲他完全無法理解溝通已經在進行當中。由這個例子可以看出，語言（乃至於溝通）當然是一種受規範的常規。[29]

---

[29] 對 Searle 來說，語言並非溝通的必要條件，因爲按照他的說法，存在著語言之外的表達方式（例如手勢等）。或者更清楚的說，因爲語言依附在心理現象之上，因此只要心理現象能被察覺，語言做爲媒介的功能就可以被省略。但是這並不代表 Searle 認爲語言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簡單地說，根據以上的重述，Searle 建立了一套將心靈與語言連結在一起的意義理論。首先，意義來自於 IS 這種本質上固有的狀態，而語言則是從心靈所派生出來的現象。此外，IS 與 SA 具有平行對稱的結構。最後，意義本身具有反映說話者 IS 與跟聽話者進行溝通二種功能。SA 不是僅能執行後者而已。一旦 SA 被用來執行溝通功能，這時就需要說話者與聽話者雙方達成一致的意圖。爲了要達成一致，某種規則或常規是必須被預設的。

意義與歷史研究

在討論過 Searle 的理論後，現在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看看 Searle 的理論能夠如何補強 Skinner 的說法。首先讓我們回到 Graham 對 Skinner 的批評。Skinner 的反駁是：Graham 的說法將行爲此一概念理解成產生一種結果 p，其中 p 必須是一個因爲該行動所產生的全新事態（states of affairs）（Skinner, 1988a: 264；2002: 107-8）。然而 Skinner 指出這樣的說法等於是說行動發動前跟發動之後必須有事態上的不同，沒有這種新事態就等於沒有行動。然而所謂行動卻不一定會創造出新事態——或用一種邏輯上的措辭，一個行動不一定會指定（assign）一個新的值給 p，只是讓受話者知道已經存在的事態是什麼而已（Skinner, 2002: 108；Davidson, 1967: 86）。因此「警告一個人是讓他們（*sic*）注意到他們身陷險境。成功地執行警告的 illocutionary act，因此在於成功地（讓他）注意到這個（身處險境）的事實（Skinner, 2002: 108）。」換句話說，語言—行動並不一定要創造出新的事態——也就是這個語言—行動創造出一個原本不存在的險境——而是轉移受話者的注意力，讓他認知到他「已經」處於一種原本就已經存在的危險狀態中。因此 Skinner 認爲 Graham 將意圖、發語與行爲分開的說法不能成立。換句話說，要理解一個語言—行動的意義，還是要回到對意圖的瞭解，因爲是意圖將發語與行爲（即(a)與(b)）連結在一起的。

一個可以被省略的工具，原因在於人類可不經語言媒介而被辨認的原始心靈狀態，數量其實有限而且形式簡單，大多數比較精巧細微的心靈狀態還是在語言存在的前提下被發展出來的（Searle, 1983: 16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對於這個問題，Searle 有關意向性的見解能夠爲 Skinner 的說法提出一些更深入的補充。前面提到，Searle 特別強調 IS 不是一種行動，而只是一種狀態或事件而已。而意向性要表現成爲語言—行動，也有二種形式：一種是反映（representation）、另一種是溝通（communication）。在前者當中，發話者的目的只是要表現其自己內心的 IS，而未必存有對受話者產生若干特定效果的意圖。[30] 這種要帶來全新事態的意圖，通常是發生在後者的情境當中。Skinner 曾經很明白地指出歷史研究必須要將這方面的意義考慮在其中（Skinner, 2002: 109），但是他自己並沒有如 Searle 一般，將意向性的行爲方式做出反映及溝通的區分。從這個角度來看，Skinner 與 Graham 都有盲點：對 Graham 來說，意義並非只有在產生預期的 perlocutionary effect 的行動才跟意圖有關；對 Skinner 來說，有時候一個語言—行動就只是想反映發話者的 IS 而已。

至於有關 Femia 這類型的批判，Skinner 的回應有點令人意外。他強調這是對他的一種誤解，因爲他贊成的是「反意圖主義式」（anti-intentionalist）的立場（Skinner, 1988a: 267；2002: 110）。這裡需要進一步的說明。Skinner 的意思是說，如果說所謂的意圖主義式的立場等同於「作者意圖決定意義」（也就是 Femia 所指出的情況），那麼他並不同意這樣的觀點，因此把他歸類爲這類的意圖至上論是錯誤的。他對意圖真正的立場其實有別於 Femia 的指控，其差異點在於雖然他跟這些主張意圖決定意義的理論家同樣看重意圖，但是雙方的差異在於 Skinner 不認爲意圖會影響語意 （semantic meaning），而是會影響語言—行動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Skinner, 1988a: 269-271；2002: 111-114）。換句話說，Skinner 把一個發語中的語意跟其中的語言—行動所表現出來的要旨（point）當成是二個不同的範疇。他論證當語意與要旨一致時，我們通常不會覺得意圖在溝通中所扮演的重要性；只有在二者的關係不是那麼明顯時，意圖的關鍵地位才會被突顯出來。舉例來說，當 S 對 H 說「請幫我倒杯水」時，其語意（S 要 H 倒一杯水）跟其要旨（S 命令並且相信 H 會倒一杯水）具有相對應的

[30] 這並不是說當發話者不存在改變事態的意圖時，事態就不會改變。有時候會出現許多預期之外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而這類狀況往往是歷史研究中的常態，本文稍後將回到這點作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內容。但是在某些特殊的發語——Skinner 特別指出「嘲諷」（irony）的情境——中，這二者不見得會有表面上的一致性。例如當 S 對 H 做出一個發語「你的腳踏在我的鞋上」時，其中的語意與要旨就出現差異，因爲前者的是「H 的腳踏在 S 的鞋上」，但後者卻是「S 要求 H 移開他的腳」。Skinner 指出，由於我們沒辦法直接從語意中判別要旨，在這樣的情況下直接去理解作者意圖就成了理解要旨的關鍵。而意圖決定意義的說法似乎沒有做出語意跟要旨的區別，直接認爲意圖會決定語意。Skinner 並不認同這點，而這也是他與這些理論家的差異之處。

Skinner 將語意與要旨的區別可以說是他的意義理論中的一大特點。[31] 根據這樣的區分，Skinner 認爲 Femia 對他的批評有許多都是誤解（Skinner, 2002: 268）。[32] 如果意圖是與要旨而非與語意有關的話，那麼 Femia 的大半指摘都是稻草人，因爲這些指責事實上都基於一個錯誤的認知：Skinner 相信意圖決定語意，然而 Skinner 所同意的卻是意圖決定要旨。與 Femia 的批評相反，事實上 Skinner 還頗認同 Femia 所說的，就是發語在語意層面，從某個角度來看，的確是不受意圖所決定的，這也是爲什麼他自稱「反意圖主義」的原因。在這個層面上，他同意思想史學家的確有可能去挖掘出一個思想家在不同文本中的一致性，特別是那些不爲其意圖所認知到的潛在一致性（Skinner, 1988a: 269）。但是這種對於意義的認知（the meaning of 'meaning'）是不是歷史研究中所應接受的？

這裡可分二種情況來討論。先假設文本語意與作者意圖間有著不盡一致的關係（例如嘲諷的狀況）。可能作者在文本中施行了某種語言—行動，但是後來的讀者卻沒有檢視出其中的 illocutionary force；另一種可能則是相反，作者在文本中並沒有某種特定的意圖，但是後來的讀者卻認爲存在

---

[31] Skinner 在早期的著作裡，他認爲語意與要旨是獨立的，而所謂的意義理論只跟前者有關，所以他說「我主要關注的不是意義而是 illocutionary acts 的施行」（Skinner, 1988a: 270）。但是在較晚期的著作裡，他把意義擴大到包括二者，「這是一個關於作者藉由發語意指或者意圖做某事（不論這個發語本身的意義爲何）的問題」（Skinner, 2002: 111）。換句話說，早期 Skinner 對「意義」採取一種較狹義的定義，認爲意義等同於發語中的語意。但是後期他改採一種較廣義的定義，認爲文句語意之外的要旨也應該包含在被理解的意義中。這個對意義的擴大詮釋具有關鍵重要性，本文稍後即將說明。

[32] 對於 Skinner 認爲遭到誤解的部分所做的澄清，請見 Janssen (19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些作者自己沒有清楚意識到的意圖。在這二種情況中，就會出現「預期以外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這裡所謂的預期，指的當然是出乎作者的預料。然而作爲一個歷史研究者，這時他就會碰到一個難題：雖然這是一個預期以外的結果，然而當這已經成爲歷史事實的時候，我們要如何理解其意義？就如同假使中古世紀的政權合法性來自於基督教這種超自然而無法驗證的力量，然而一旦世俗的政權真的按照基督教教義所建立起來，這時不管基督教是真是假，[33] 或者耶穌本人是否曾經意圖在人間建立世俗政權，實際上發生的狀況就是一個「預期以外的狀況」出現——一個聖經沒有直接論及的基督教政權。

對於這樣的詮釋，Skinner 認爲這是一種不完全的理解。如同上面所說，意義是一種含括語意與要旨的「叢集概念」（cluster concept）（梁裕康，2006：113-117）。上面例子中所謂的歷史事實所根據的推論其實完全省略了作者意圖的重要性，因此這樣的推論即使不能夠說錯，也是一種不完整的詮釋。或者更明白地說，這些讀者所接收到的「意義」已經不是完整的作者原意，而已經參雜了讀者本身的想像。在這種情況下，讀者本身要如何去應用文本是一回事。但是不論他怎麼運用，他必須知道一點：就是這些應用——儘管是受到某些思想家的啓發——也不能說這就是該思想家的看法。也就是說，對 Skinner 而言，歷史研究不僅是要研究文本的語意而言，而且還要看看作者到底要透過文本做什麼。事實上，後者的重要性可能凌駕過前者。

然而爲什麼後者較前者重要？Skinner 似乎並沒有提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因爲從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Skinner 充其量只能告訴我們「爲什麼研究歷史文本的意義必須考慮作者意圖」，卻沒有辦法解釋「爲什麼要旨比語意重要」。當然 Skinner 可能沒有做出這麼強的結論，認爲在理解文本意義時要旨的重要性凌駕語意。但是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對於文本意義的解讀很可能出現歧異，尤其是在 Skinner 自己關注的像是嘲諷的情況中。以他自己所舉的例子來說，當 Daniel Defoe 說宗教上的異議者應該被壓制甚至處決時，其語意是要頌揚一種宗教不寬容的態度。但是因

[33] Skinner 對於眞理（truth）的相關討論，請見梁裕康（2006：119-1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 Defoe 是以嘲諷的口吻寫下這樣的語句，而其中真正要施行的語言—行動恰好與語意相反，是在譏笑這種宗教不寬容（Skinner, 1988a: 270-271；2002: 112）。Skinner 在這裡近乎直覺地主張，Defoe 的文本真實意義是不在其語意而在於其要旨。就這個例子來說，Skinner 的主張差不多是要告訴我們可以完全忽略 Defoe 此處之文本語意。但是何以如此？Skinner 沒明說的論點應該是：當語意與要旨衝突時，決定文本真實歷史意義的是後者。然而後者的重要性到底從何而來？Skinner 並沒有做出很清楚的說明。

對於這個問題，Searle 的理論可以提出一個有力的補充。前面提到，當一個發語者做出一個發語時，若他／她不僅是做出發語（say it）且很認真看待此一發語、而非隨便說說（mean it）時，他／她必須同時滿足此發語內的 IS 與 SA 所設定的滿足條件。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其中 IS 的滿足條件本身也是 SA 的滿足條件之一——或者換句話說，滿足 IS 是 SA 的滿足條件之一。因此一個語言—行動必須要把意圖或意向性考慮在其中，才能真實反映（represent）作者要藉他所做的發語（或更精確地說，發語中的語意）來做什麼。

結論：溝通產生意義

簡單的說，透過 Searle 的理論，我們可以把一個乍看之下很簡單的發語，找出其背後的深層結構。而且這個深層結構是具有等級性的：人類的意義是從他的意向性所發出，由意向性施行一種語言—行動，而這個語言—行動最後是以發語（以及其中的語意）爲形式來完成。因爲這樣的層級關係，我們可以清楚的理解，爲什麼解讀出隱藏在文本背後的作者意圖是理解歷史文本意義的重要關鍵。[34]

[34] 第二位審查人認爲，即使承認文本的詮釋性意義與其所處的語言或意識型態脈絡相關，Skinner 的理論似乎偏重作者意圖對於文本意義的影響。尤有甚者，審查人認爲這似乎與 Searle 把心靈—語言—社會實體視爲一個整體的見解不甚相容，畢竟按照 Searle 的說法，意義之所以能展現出來，原因在於心靈、語言以及社會實體三者能夠相互一致（agree）。換句話說，從 Searle 的理論推斷，脈絡的對於文本意義的重要性絕對不下於作者的意圖。循此 Searle 的說法反而旁證了論者認爲 Skinner 過份強調作者意圖的批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然而即使這樣的說法能成立，另一個問題仍然有待解釋：爲什麼作者需要大費周章，冒著讀者誤讀的風險，用這種非直接的說話方式（indirect speech）來說一些平鋪直敘就能說明白的意義？在動機上，作者可能出於許多理由。除了文學或藝術上的原因（例如作者試圖展現他的寫作技巧）以外，一些政治或社會也有可能造成這樣的結果（例如在言論受到壓制的社會中的異議份子），或者一些純粹語言學上的因素（這是一種在語言上比較經濟（economic）的方式，可以長話短說），都有可能促使作者以這種非直接的方式從事寫作。然而 Skinner 指出了研究歷史文獻時歷史學家所遇到的一個特殊難題：通常作者採用這種寫作方式時，都會設想他的讀者總是有辦法理解（uptake）他在文本中的弦外之音（也就是他的要旨）。但是對那些距離作者寫作時空環境已經十分遙遠的後世讀者來說，他們是否具備作者原本所假設的解讀能力就大有疑問。這種解讀能力的差異基本上是來自於對不同脈絡下的認識程度不同（Skinner, 1988a: 271-273；2002: 112-114）。[35]

但是就像 Skinner 自我辯解說他是「反意圖主義者」一般，這是對他的一種誤解。Skinner 並沒有說作者意圖獨佔了文本的意義，他所反對的只是傳統詮釋文本的方法中，幾乎完全忽略了作者意圖的重要性。與審查人的批評相反，事實上他認爲要全面地理解文本的意義，我們必須要認知到文本不只是文本，而是一種溝通（communication）。溝通當然不是單方面認知的過程，一次成功的溝通應該是溝通雙方能夠達成某種協議或相互理解，也因此「意義」在 Skinner 的理論中其實是一種叢集概念。詮釋文本包含了一系列的過程：文本字面上所產生的文義、讀者讀到文本後對其中意義所產生的心證、一直到作者著述的意圖。對 Skinner 來說，「意義」其實是這些過程的總和（梁裕康，2006：113-117），而非傳統方法只包含第一項，或者如若干主張「作者已死」的學者所認爲的只包含第二項。如同本文開頭所指出，「脈絡」與「意圖」所決定的其實是文本在不同層面中的意義：前者主要決定第一項，而後者主要決定的則是（Skinner 認爲長久以來一直被忽略的）第三種意義。而這正是 Skinner 的理論被視爲一種（linguistic）holism 的最大特徵。從這個角度來看，Skinner 與 Searle 的理論事實上都強調脈絡與意圖對於意義的影響。只不過 Skinner 爲了要強調傳統思想史研究中長久以來都忽略了其中的第三種意義，才對此特別加以著墨。然而這並不表示 Skinner 認爲作者意圖能夠獨佔文本意義，或者更精確地講，獨佔作者與讀者經由文本相互溝通的過程。關於溝通與思想史研究間的關係，見梁裕康（2007：203-207）。

35 這個部分因爲與意圖或意向性的關係較爲間接，所以不擬在此處討論。筆者將另做專文分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最後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Skinner 的意義理論的對象是歷史文本乃至於文本作者的意圖，而且他所要分析的是一種——按照 Searle 的說法——用於溝通而非用於反映作者意圖的語言—行動。當語言—行動用於溝通時，雖然 Searle 認爲，通常是用來改變一個事態，但是 Skinner 特別指出思想家所要達成的要旨，如同前面所提過的，不一定是要創造或改變一個事態，而是純粹要影響讀者去認知到他原本沒認知到的既存事態。Skinner 的要點在於：雖然乍看之下這樣的語言—行動並沒有改變世界，但是他改變了讀者的認知方向（the way of seeing）。

如果上述的說法成立的話，那麼對於 Skinner 有關意義與意圖的批評應該可以透過 Searle 的理論而獲得某種程度的澄清。對於 Skinner 運用語言—行動理論尋找歷史意義的質疑，Searle 的理論可以給予一些有力的回應：任何文本其實都是一種語言—行動，而文本的意義不僅存在於其語意上，更在於這些文本反映了作者何種心理狀態、乃至於作者想要如何改變讀者的心理狀態。從這個角度來看，所有文本不是要反映作者心理狀態，就是作者試圖要與讀者溝通。如果忽略了這項目的（也就是 Skinner 不斷在強調的所謂「要旨」），只著重重現文本語意的話，的確會忽略掉一些很重要的意義。

另一方面，透過 Searle 的理論，我們可以看到：由於 SA 與 IS 呈現一種平行關係，其中前者反映後者而後者卻是本質上固有的。這意味著在一個嚴肅而成功的語言—行動中，即使是文本的字面語意，也取決於作者寫作時所展現的意圖，而所謂的脈絡則是讓我們解讀作者意圖的條件。換句話說，Searle 的理論似乎可以有效地反駁那些認爲 Skinner 過份強調作者意圖對文本意義的重要性的說法。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梁裕康，2006，〈語言、歷史、哲學－論 Quentin Skinner 之政治思想方法論〉，《政治科學論叢》，28: 91-12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梁裕康，2007，〈語境與典範－論 John Pocock 之方法論中的一些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20: 183-228。

二、英文部分

Austin, J. L. 1975.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2nd edition, ed. J. O. Urmson and Marina Sbisà.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evir, Mark. 1999. *The Logic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vidson, Donald. 1967. "The Logical Form of Action Sentences." In *The Logic of Decision and Action*, ed. Nicholas Rescher. Pittsburgh, Pe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81-95.

Femia, Joseph V. 1988. "An Historical Critique of 'Revisionist' 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56-175.

Fotion, Nick. 2000. *John Searl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Graham, Keith. 1988. "How Do Illocutionary Descriptions Explain?"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47-156.

Grice, H. P. 1957. "Meaning."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66(3): 377-388.

Gunnell, John G. 1982. "Interpretation and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 Apology and Epistemology."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6: 317-327.

Hood, F. C. 1964. *The Divine Politics of Thomas Hobb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ssen, Peter L. 1985. "Political Thoughts as Traditionary Action: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Skinner and Pocock." *History and Theory* 24 (2): 115-146.

Keane, John. 1988. "More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4-217.

Kjellström, Peter. 1995. “The Narrator and the Archaeologist: Modes of Meaning and Discourse in Quentin Skinner and Michel Foucault.” *Statsvetenskaplig Tidskrift* 98: 21-41.

LaCapra, Dominick. 1980. “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 *History and Theory* 19: 245-276.

Macpherson, C. B. 1962.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Hobbes to Loc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dell, David Paul. 2000.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s a ‘Vocation’: A Pragmatist Defence.” In *Vocations of Political Theory*, ed. Jason A. Frank and John Tambornino, Minneapolis, Min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18-142.

McCullagh, C. Behan. 1998. *The Truth of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Palonen, Kari. 2003. *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 Cambridge: Polity.

Rée, Jonathan. 1991. “The Vanity of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22: 961-983.

Searle,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ohn R. 1980. “Minds, Brains, and Programs.” *The Behavioural and Brain Sciences* 3:417-457.

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rle, John R. 2002. “Speech Acts, Mind, and Social Reality.” In *Speech Acts, Mind, and Social Reality: Discussions with John R. Searle*, ed. Günther Grewendorf and Georg Meggle.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Skinner, Quentin. 1964. “Hobbes *Leviathan*.” *Historical Journal* 7: 321-323.

Skinner, Quentin. 1965. “Hobbes on Sovereignty: An Unknown Discuss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olitical Studies 13: 213-218.

Skinner, Quentin. 1966. “The Limits of Historical Explanations.” *Philosophy* 41: 199-215.

Skinner, Quentin. 1967. “Science and Society in Restoration England.” *Historical Journal* 10: 286-293.

Skinner, Quentin. 1970. “Conventions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 118-138.

Skinner, Quentin. 1971. “On Performing and Explaining Linguistic Actions.” *The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1: 1-21.

Skinner, Quentin. 1972a. “Social Meaning and the Expla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Society*, Series IV, ed. Peter Laslett, W. G. Runciman and Quentin Skinner. Oxford:Basil Blackwell: 136-157.

Skinner, Quentin. 1972b. “Motives, Intention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exts.” *New Literary History* 3: 393-408.

Skinner, Quentin. 1974. “Some Problems in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Political Theory* 2: 277-303.

Skinner, Quentin. 1988a.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31-288.

Skinner, Quentin. 1988b. “Meaning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9-67. (Originally appeared in *History and Theory* 8 (1969): 3-53.)

Skinner, Quentin. 2002. *Visions of Politics: 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trawson, Peter. 1964. “Intention and Convention in Speech Acts.”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3(4): 439-460.

Taylor, Charles. 1988. “The Hermeneutics of Conflict.”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18-228.

Tully, James. 1988. “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 In *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 ed. James Tull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25.

Turing, A. M. 1950.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59: 433-460.

Warrender, Howard. 1957.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Hobbes: His Theory of Obligation*. Oxford: Clarendon.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2n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ntion and Meaning

-- On Some Questions in Quentin Skinner's Theory of Meaning

*Yu-Kang Liang**

Abstract

Quentin Skinner, the leading figure of the so-called 'Cambridge School', has developed a unique methodology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One tenet in his theory is that the meaning of a text depends more heavily on the author's intention in writing than on the semantic level. Some academics have criticised Skinner's theory for putting too much emphasis on the author's intention than on the text itself. In addition to spelling out these criticism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by applying John Searle's theory (contending that the source of meaning comes from language's capacity to represent human Intentional states), the meaning of a text rests on both the agreement of the semantic level and also on the author's Intentional states. Thus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Skinner's argument is more convincing than those criticisms against him.

Keywords: Quentin Skinner, John Searle, Speech-Act, Meaning, Intention/ Intentionality

* Currently assistant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